

郁达夫◎著

回忆

鲁迅

郁达夫谈鲁迅全编

郁达夫比鲁迅小十五岁，但他们是同时代人。郁达夫写鲁迅，没有塑造光辉形象的任务，也没有谰托知己把自己写成『老战友』的意图，因而写得潇洒，正因为潇洒，也就真实。

回

忆

鲁迅

郁达夫谈鲁迅全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忆鲁迅·郁达夫谈鲁迅全编/郁达夫著. -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
(大家的鲁迅)

ISBN 7-80646-849-8

I. 回… II. 郁… III. 鲁迅(1881~1936) - 生平事迹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8906 号

责任编辑 黄慧鸣

特约编辑 曹 木

封面设计 许 菲

版面设计 周艳梅

书 名 回忆鲁迅·郁达夫谈鲁迅全编

出版发行 上海文化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bcm@public1.sta.net.cn

网 址 www.shwenyi.com

邮政编码 20002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5.625

字 数 136,000

版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1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80646-849-8/K·117

定 价 12.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2431119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本书编辑说明	1
回忆鲁迅	11
致周作人（1923 年 10 月）	36
《生活与艺术》书后	37
历史小说论	38
给《世界日报副刊》的编者	43
读《老残游记》	46
对于社会的态度	50
革命广告	57
讨钱称臣考	60
《大众文艺》第一期编辑余谈	62
《大众文艺》第四期编辑余谈	63
最后的一回	65
致钱公侠（1929 年 4 月）	68
致周作人（1929 年 9 月）	69
致周作人（1930 年 5 月）	71
致周作人（1930 年 6 月）	72
寻找鲁迅启事	74
赠鲁迅先生	75
萧伯纳与高尔斯华绥	76
移家琐记（二）	78
中国目前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	80
致周作人（1935 年 1 月）	81

鲁迅与周作人的散文	83
继编《论语》的话	91
致叶圣陶（1934年9月）	93
小说与好奇的心理	94
我所喜爱的文艺读物	96
国防统一阵线下的文学	97
致许广平唁电	102
对于鲁迅死的感想	103
怀鲁迅	104
今日的中华文学（上）	105
今日的中华文学（下）	107
鲁迅先生纪念奖金基金的募集	109
鲁迅的伟大	111
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	112
手民之误	113
抗战以来中国文艺的动态	115
几个问题	118
我对你们却没有失望	123
我对你们还是不失望	125
友人们的消息	127
一二八的当时	128
致许广平（1939年2月）	131
致萧玲（1939年5月）	132
《回忆鲁迅》题记	133
纪念柴霍夫	134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鲁迅先生生活散记》编者附志	136
鲁迅逝世三周年纪念	137
“文人”	139
为郭沫若氏祝五十诞辰	142
敬悼许地山先生	144
附录	147
忆郁达夫与鲁迅的交往（王映霞）	148
林语堂和鲁迅的一次争吵（王映霞）	154
我记忆中的鲁迅与许广平（王映霞）	156
《郁达夫日记》残片中的鲁迅（丁言昭）	160

[本书编辑说明]

本书编入了郁达夫的《回忆鲁迅》长文和其他谈鲁迅的全部文字。

读了这些文字，你会感到郁达夫对鲁迅的情谊是十分真挚的。

两人何时第一次相见，已无从查考。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说：“和鲁迅第一次的见面，不知是在那一年那一月那一日，——我对于时日地点，以及人的姓名之类的记忆力，异常的薄弱。”查《鲁迅日记》，第一次记到郁达夫是在1923年2月17日：“午二弟邀郁达夫、张凤举、徐耀辰、沈士远、尹默、坚（兼）士饭，马幼渔、朱遇先亦至。谈至下午。”连周氏兄弟在内共十人，是一次热闹的文化人的聚会。

郁达夫的第一本小说集《沉沦》，由上海泰东图书局于1921年10月出版，很快就遭到一些人的围攻，被指为“色情文学”、“不道德的文学”。周作人在1922年3月26日的《晨报副镌》上发表《沉沦》，为郁达夫抱不平，指出小说所写的“青年的现代的苦闷”，是“不满足于现实，而复不肯遁于空虚”的表现，是有其社会意义的。周作人还说：“《沉沦》是一件艺术的作品。”发表过《人的文学》、《思想革命》的名噪文坛的周作人，竟如此肯定《沉沦》的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对于初出茅庐遭到围攻多少

有些惶恐的郁达夫来说，真是莫大的支持和鼓励。从此郁达夫就经常到八道湾聆听周作人的指点，同时也结识了同样誉满文坛的乃兄鲁迅。

在“兄弟情断”以后，郁达夫仍然是八道湾周宅的常客，同时也没有少去砖塔胡同和后来的西三条鲁迅的家。1926年出版的《彷徨》中，收有一篇未曾发表过的《孤独者》，里面写到了《沉沦》，无疑是再次肯定《沉沦》的社会意义，给了郁达夫意外的惊喜和鼓舞的力量。

以后，鲁迅和郁达夫都先后南下到广州而到上海，两人始终保持着联系。郁达夫总是把创造社的出版物及时地寄给鲁迅，使鲁迅感到创造社确是一个生气勃勃的文学社团。以致在1926年11月7日给许广平的信中，鲁迅说：“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对于‘绅士’们仍然加以打击，至多无非不能回北京去，并不在意。第二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力写些文字。”鲁迅希望联合创造社，郁达夫也希望联合鲁迅。在郁达夫编辑发稿的1927年4月出版的《洪水》第三卷第三十期上，发表《中国文学家对于英国知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第一个签名的是成仿吾，第二人是鲁迅。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后，创造社在广州受压，鲁迅很同情。他在1927年9月25日致李霁野信中说：“创造社和我们，现在感情似乎很好。他们在南方颇受压迫了，可叹。看现在文艺方面用力的，仍只有创造，未名，沉钟三社，别的没有，这三社若沉默，中国全国真成了沙漠了。”在1928年1月出版的《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八期上，刊出了“创造周报复活了”的消息，周报特约撰述员三十余人，第一人就是鲁迅。鲁迅的名字一而再地在创造社的出版物上出现，无疑是郁达夫努力的结果。

然而，真是“风云突起”。使郁达夫大出意料的是，从革命前线退下来的创造社一些老社员和从日本归来的一些新社员，主张提倡革命文学而批判不革命或反革命的鲁迅、周作人、刘半农、叶圣陶等人。在脱期好

几个月的《洪水》第三卷第二十五期上，成仿吾发表《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称鲁迅等人“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是“以趣味为中心的生活基调”而产生的“以趣味为中心的文艺”。而在《文化批判》创刊号上发表的冯乃超的《艺术与社会生活》中，称叶圣陶“只描写个人和守旧的封建社会”，“是中华民国的一个最典型的厌世家”；称鲁迅则是：“鲁迅这位老先生——若许我用文学的表现——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隐遁主义！”冯乃超还写到了郁达夫头上：“他对于社会的态度与上述二人没有差别。”从此就开始了一场由创造社和太阳社的一些成员参加的对鲁迅的围攻，硝烟中流弹所及，还有周作人、叶圣陶、刘半农、钱玄同乃至郁达夫。郁达夫写了篇《对于社会的态度》在《北新》半月刊上发表，反驳了冯乃超的一些说法，回顾了创造社从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发起成立以来内部的种种矛盾。他再次宣布：与创造社脱离关系，并与鲁迅携手编《奔流》月刊。对于鲁迅，他在文中说：“我对于鲁迅哩，也是无思无怨，不过对他的人格，我是素来知道的，对他的作品，我也有一定的见解。我总以为作品的深刻老练而论，他总是中国作家中的第一人者，我从前是这样想，现在也这样想，将来总也是不会变的。”郁达夫宁可脱离创造社而坚持与鲁迅合作，是他人生道路上的关键性抉择，也是他文学道路上的关键性抉择。

鲁迅和郁达夫在上海，不但合编《奔流》杂志，还并肩与梁实秋展开了一场关于卢骚评价问题的论争。两人还一起参加了共产党所领导的互济会，接着又一起参加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当中共中央指示党员作家要联合鲁迅成立左联之际，那些“左”得可爱的“无产阶级作家”只好去求郁达夫帮忙，请他先去鲁

迅那里疏通疏通。郁达夫是个不记仇的人，他就答应先去做鲁迅的工作。现在不少研究者都写到，左联成立之初，鲁迅提议：郁达夫也为发起人之一，殊不知在此之前，倒是郁达夫先劝鲁迅作为发起人之一的。郁达夫是个“自由”惯了的人，他不适宜参加纪律严格的政党、政团一类的活动，他特别不愿参加飞行集会、散发传单、电线杆上贴标语之类的事。权衡再三，他后来决定退出左联。左联主席团听说郁要退出左联，就先下手为快，宣布“开除”。郁退出左联后，鲁迅仍与他和好如初，鲁迅是十分了解这位老朋友的。

鲁迅与郁达夫之间，存在着思想差距，两人之间也是心昭的。在一些公开发表的文字中，鲁迅并不掩饰他对郁达夫的某些言行是有一定程度的保留的。例如，在《伪自由书·前记》中，鲁迅说：“直白的说罢，我一向很回避创造社里的人物。这也不只因为历来特别的攻击我，甚至于施行人身攻击的缘故。大半倒在他们的一副‘创造’脸。虽然他们之中，后来有的化为隐士，有的化为富翁，有的化为实践的革命者，有的也化为奸细，而在‘创造’这一面大纛之下的时候，却总是神气十足，好像连出汗打嚏，也全是‘创造’似的。我和达夫先生见面得最早，脸上也看不出一种创造气，所以相遇之际，就随便谈谈；对于文学的意见，我们恐怕是不能一致的罢，然而所谈的大抵是空话。但这样的就熟识了，我有时要求他写一篇文章，他一定如约寄来，则他希望我做一点东西，我当然应该漫应曰可以。但应而至于‘漫’，我已经懒散得多了。”鲁迅的这一段话，对郁达夫的友谊、了解和某种程度的保留，可说是坦诚地和盘托出了。

而在郁达夫，他对鲁迅的敬重、尊重，视为前辈，视为中国当代的第一作家，却是毫无保留的。鲁迅送给他后来被题为《阻郁达夫移家杭州》的诗，他是心领神会的，但马上要离开杭州，事实上也确有一些困难：他已建造了“风雨茅庐”，已安顿了家庭，怎么能说搬家就搬家呢？而郁达

夫书赠鲁迅的诗却是：“醉眼朦胧上酒楼，彷徨呐喊两悠悠。群盲竭尽蚍蜉力，不废江河万古流。”既对当年“左”公的攻击予以鞭斥，又对鲁迅尤为歌颂。能够称得上“不废江河万古流”的，是历史上的不朽人物，是载入史册的伟人。这就是郁达夫心目中的鲁迅。

郁达夫对鲁迅的敬仰，还可举出不少事例。当福州的一张报纸要他说出“我所喜爱的文艺读物”时，他的答复是：“鲁迅：《野草》；茅盾：《子夜》；沈从文：《阿丽思漫游中国》。”当一家杂志在讨论“中国目前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时，他的答案是：“在目下的中国作品中，以时间的试炼来说，我以为鲁迅的《阿Q》是伟大的。以分量和气概来说，则茅盾的《子夜》，也是伟大的。”又说：“新文学自创始以来，拢总还不上二十年的光景，已经有了这几部作品，大约将来的更有伟大的作品出来，是在预料中的，大家正可以不必亟亟。”这就是郁达夫对鲁迅作品的评价。

郁达夫也关心鲁迅的生活，鲁迅的健康，鲁迅的安全。“一二八”战争中，郁达夫知道鲁迅的家是在火线之中。他打听不到鲁迅一家是否已转移到安全地带的信息，只得在申报刊登寻找周豫才的启事。及至在四川南路内山书店分店的楼上会见了鲁迅，两人才开怀笑谈各种有趣的谣言。鲁迅说他脸上“看不出那么一种创造气”，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没有“唯我独尊”、“唯我独革”的那种“气概”，也没有心胸狭隘的派性，比较随和就成了他为人特点。在当年文坛错综复杂的各种派系关系中，郁达夫却都有朋友：他与新月派关系不错，与徐志摩相处特好；和语丝派元老、后来成为“京派”头面人物的周作人，关系非同一般；和论语派首领、“海派”代表性人物林语堂，称兄道弟；与茅盾、郑振铎等文学研究会中坚，也友情怡怡；现代派的施蛰存等人可说是老朋友，而在玩晚明小品的热潮时期，他又和刘大杰、阿英等人打得火热；传说他秘密加入过“太阳社”，虽然此说待考，但和蒋光慈、杨邨人确实关系密切；就是与已经分

手的原创造社的“左”派诸公，见面时也保持着“点头之交”。但郁达夫并不是四面讨好、八面玲珑的人，他有他的待人处事的原则，他和胡适、梁实秋都有过争论，他的脱离创造社而携手鲁迅更体现了他的原则，而周作人、张资平后来失足时，他都坚决予以谴责。由于郁达夫人缘好，大家又都知道他与鲁迅相得，因而当方方面面需要与鲁迅沟通时，他就成了一座桥梁。前面提到的左联筹组之初，他去鲁迅那里疏通，就是一例。这类例子很多。沉钟社三大员冯至、陈炜谟、陈翔鹤第一次去鲁迅家拜望，是郁达夫带的路。黎烈文想邀约鲁迅为《申报·自由谈》写稿，去做说客的是郁达夫。据郁达夫自述：良友图书公司、天马书店、生活书店办《文学》杂志，“对鲁迅的稿件，开头大抵都是由我为他们拉拢的”。“尤其是当鲁迅对编辑者们发脾气的时候，做好做歹，仍复替他们调停和解这一角色，总是由我来担当。”甚至，北新书局拖欠鲁迅版税，鲁迅请律师准备对簿公堂时，也是郁达夫应书局之请，从中斡旋而化干戈为玉帛。在一次宴席上，鲁迅和林语堂发生了争执，两人都气得脸色发青，鲁迅站起来高喊着：“我要声明！我要声明！”郁达夫一面将林语堂稳住，一面向鲁迅解说“误会”，这场由李小峰掏腰包的宴请总算没有半途崩散。文坛需要郁达夫，鲁迅也需要郁达夫。

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说：他离开左联，公开身份好像站在超然的地位，其实为左联及革命工作者帮了不少忙。“除来不及营救，已被他们杀死的许多青年不计外，在龙华，在租界捕房被拘去的许多作家，或则减刑，或则拒绝引渡，或则当时释放等案件，我现在还记得起来的，当不只十件八件的少数”。这话决非虚夸。郁达夫之所以能营救一些人，因他大哥郁华是江苏省高等法院上海刑庭庭长。例如孟超1932年在上海被捕，就是通过郁达夫的帮助出狱的。郁华有一定的正义感，爱国。他主张惩办汉奸，于1939年11月被日伪特务暗杀于上海。

鲁迅逝世，郁达夫是在福州看到10月19日当天的报纸才知道的。他立即给许广平打电报：“乍闻鲁迅噩耗，未敢置信，万祈节哀。”并立即乘上福州去上海的轮船（当时福州至上海的最快交通工具），赶着去见鲁迅最后一面。他在轮船上手书：“鲁迅虽死，精神当与我中华民族永在。”一到上海，就交上海《辛报》发表，后又在《海燕报》刊出。10月22日上午10时，船靠了岸，他立即赶往胶州路万国殡仪馆，“遇见的只是真诚的脸，热烈的脸，悲愤的脸，和千千万万将要破裂似的青年男女的心肺和紧捏的拳头”。在丧仪中，他没有能参加抬棺、守灵、执绋等事。胡风说：“由鲁迅生前接近的或没有攻击过鲁迅的十来的人抬。”郁达夫合乎这两个条件呀，“生前接近”和“没有攻击过鲁迅”；但抬棺、守灵、执绋是“青年作家”的事，或许郁达夫此时已四十一岁，应归到“中老年作家”的一档了。在墓地上，发表简短讲话的有蔡元培、沈钧儒、宋庆龄、章乃器、萧军、内山完造、邹韬奋，胡愈之最后读哀辞。是否也能让郁达夫说上一两句呢？或许是因为夜幕已在降临，没有时间可让他发言了。总不会某些人以为他是“落后作家”而没有推他发言吧？过去发表的鲁迅丧仪照片中，没能见到郁达夫的面影，不免有点为他不平。不久前出版的孔海珠著的《痛别鲁迅》中，却看到了郁达夫在送葬队伍中的照片，他在宋庆龄、黎沛华的旁边，位置还不差啊！丧仪后，他在10月24日就写了《怀鲁迅》一文。庄重而激情地写道：“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的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在这篇文章中，郁达夫还说：“生死，肉体，灵魂，眼泪，悲叹，这些问题与感觉，在此地似乎太渺小了，在鲁迅的死的彼岸，还照耀着一道更伟大，更猛烈的寂光。”接着，他又为日本改造社出版《大鲁迅全集》而用

日文书写《鲁迅的伟大》一文，称：“如问中国自有新文学运动以来，谁最伟大？谁最能代表这个时代？我将毫不踌躇地回答：是鲁迅。”他又说：“当我们见到局部时，他见到的却是全面。当我们热中去掌握现实时，他已经把握了古今与未来。要全面了解中国的民族精神，除了读《鲁迅全集》以外，别无捷径。”在当时，在作家中，给予鲁迅如此崇高的历史评价的，只有郁达夫！

出于对鲁迅的深深怀念，郁达夫在国破家危的忧患之际，在湖南汉寿躲避战乱的住所里，在缺少鲁迅著作和参考资料的情况下，以抑制不住的激情，开始了《回忆鲁迅》的写作。这是在鲁迅辞世不久，继许寿裳已在报刊上发表的回忆鲁迅的文字之后，又一部翔实记载鲁迅生平事迹的回忆录。

如果说，许寿裳写关于鲁迅的回忆录，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把自己所知道的这位生死之交的老友的事迹记下来，以传之后世，他写得很严谨，因而也很真实；那么，郁达夫写关于鲁迅的回忆录，也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把自己所崇敬的这位老友的事迹，就自己所知道的写下来，他没有塑造光辉形象的任务，也没有谬托知己把自己写成“老战友”的意图，因而他写得潇洒，正因为潇洒，也就真实。许寿裳和郁达夫都写了重要的史事，如写鲁迅的剪辫，写鲁迅的赠《自题小像》事，写鲁迅的支持女师大学生运动，写鲁迅毅然去吊唁杨杏佛，临行时还把袋里的家门钥匙交给了许广平；如写鲁迅与《现代评论》派论争，与撤他职的章士钊的争斗，对国民党因他参加自由运动大同盟而通缉的姿态。然而，两人也都写到鲁迅的生活小事，如许寿裳竟然写到：鲁迅到东京不久曾给他写信，说同学们在浴池里偷窥隔壁池里的裸女而阳狂；如郁达夫写到了鲁迅冬天不穿棉裤“是抑制性欲的意思”。许、郁这样写，我们认为，当然不是意存亵渎。

然而，在有些人看来，“鲁迅的棉裤”就成了问题。舒廉（江树廉）

先生在2001年9月1日的文汇报读书周报上，发表《莫把鲁迅研究引向庸俗化》一文，举出两个“庸俗化”的例子。一是有人认为，鲁迅日记中的“夜濯足”，就是“隐晦地记载了他和许广平的性生活”。事实上没有人这么说过。因为鲁迅日记中，1913年他单身住在绍兴县馆，就记有“夜濯足”。当时许广平14岁，还在广州读书。这个例子肯定是江先生自己编出来的。二是有位“研究者”说“鲁迅在北方的冬天也只穿单裤，是为了抑制性欲”。江先生没有指出这位“研究者”的姓名，不知是否暗指郁达夫？但郁达夫说的是“不穿棉裤”，怎么被改成“只穿单裤”了呢？是否这样可以把问题弄得更尖锐些？而且，郁达夫是在六七十年前说的，作为“当前”研究鲁迅的例子，是否时间上相隔太远而不大合适？对于“冬天不穿棉裤”，是否可以允许有几种解说呢？一是“节约说”，是为了生活俭朴，是为了节约。这说法是没有问题的。但“不穿棉裤”的事实是：朱安做了棉裤，母亲叫她放在鲁迅床上，期望鲁迅从外面回来，不留意时把棉裤穿了。不料鲁迅见了棉裤，就掷了出来。已经做好的棉裤掷了出来，是否和节约稍稍有点不合？因而也就有了第二种说法，“方便说”。棉裤比较笨肿，如穿夹裤，里面穿条厚实点的单裤，外出时西服有大衣，中服有棉袍，也是可以的，而且方便。第三种说法，就是“抑制性欲说”。这是一个学生说的，郁达夫把它写入书中，当然是认可了。此说是否就一点道理都没有呢？是否还可以有第四种说法呢？事实上不是已经有了吗？把郁达夫认可的说法，称之为“诋毁”、“诬蔑”，我们是不敢苟同的。因为这不合乎郁达夫的原意，更不符合郁达夫对鲁迅一贯崇敬、尊重的态度。但事情竟然还没有完。在不久前的文学报上，有一位教授的一则短论中，又在寻问：“鲁迅的棉裤是怎么回事？”唉，郁达夫在大半个世纪前写的一句话，而且这句话后来并没有什么人引用或发挥，到了新世纪的头五年中，竟成了一起公案！难道这就是大半个世纪以来我们文化界的“进步”？是大半

个世纪以来“鲁迅研究”或“保卫鲁迅”的成果？事情实在太蹊跷了！我们不得不在这里说上几句，也算是对读者有个说明。

郁达夫比鲁迅小十五岁。十年一辈的话，属于两辈的人。但他们是同时代人。从1920年代到1930年代，他们交往了约十五年。在鲁迅的同时代人中，郁达夫是值得研究的一位。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有了王自立、陈子善担任特约编辑的《郁达夫文集》（花城出版社1982年初版）、王自立、陈子善编著的《郁达夫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初版）和陈子善、王自立编的《回忆郁达夫》（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初版）。这三部书的编辑出版，是研究郁达夫的最重要最基础的三项重大工程。但是二十多年来，我们在郁达夫研究中还有其他重要的收获吗？鲁迅与郁达夫的联系、友谊、比较的研究应该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但现在好像也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与我国二十多年来经济发展的形势相比，学术研究的发展明显的滞后，其中包括对郁达夫的研究。

本书辑录的《回忆鲁迅》和郁达夫谈鲁迅的全部文字，都尽可能采用最初发表的版本，不作任何文字改动，以存其真。除《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因篇幅太长只节录了直接与鲁迅有关的两节外，其余文章都是全文。我们还附录了三篇郁达夫当年的妻子王映霞写的有关鲁迅的回忆录，供读者参考。

倪墨炎 陈九英

2006年2月于上海

〔回忆鲁迅〕

这是长篇回忆录。曾连载发表于1939年2月至8月的上海《宇宙风乙刊》。后被编入宇宙风社1940年1月出版的多人集《回忆鲁迅及其他》。作者生前未編集出版过。

